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汉学发达史

〔中〕 莫东寅 著



大象出版社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汉学发达史

[中] 莫东寅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发达史/莫东寅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7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ISBN 7-5347-2758-8

I. 汉… II. 莫…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331 号

汉学发达史/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特约编辑 谢 方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王 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4.625

字 数 101 千字

定 价 9.3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编者说明

这本《汉学发达史》最初为民国32年(1943年)莫东寅先生所作,1949年1月由文化出版社印行,1989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竖排影印本。为便于学术研究参考,我社特予以重刊。在重刊之前,编者作如下说明:

一、为保持旧籍原貌,除将繁体字改作简体字外,一般不作改动。

二、囿于时代局限性,本书中某些文字有悖于我们今天的提法,因此对这些不妥当的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但不违背原意。

三、对原书排版中明显的错讹之处(包括西文、标点符号等)作了必要的订正。对一些明显错误的时间标注,在原文后的括号内用编者注的方式以楷体标出。

四、原书中某些行文段落太长,不便阅读,因此对某些段落又重新进行划分。

五、原书中所列书刊名均没有书名号,为方便读者阅读,均加补书名号。西文部分采用通行斜体字处理,以示区别。

叙言

欧西之汉学(Sinology)研究,由来久矣。彼土文献上早有东方之知识,关于中国者,西元前后,有二系统:一曰赛里加(Serice)、赛里斯(Seres)之系统,由于阿尔泰语绢字之转音,传自陆路,赛里加指中国地而言,赛里斯指中国人而言;一曰秦(Sin)、秦尼(Sinai)之系统,由于秦政统一中国后之名称,传自海路,秦指中国地而言,秦尼指中国人而言。六七世纪,又有二称:一曰陶格司(Taugas),始于北魏拓跋本姓,传自陆路;一曰秦尼斯坦(Chinistan),仍始于秦字,传自海路。

自七世纪初至八世纪,阿拉伯人随伊斯兰教之兴盛,东西伸张其势力,因国土广袤,邮驿完备,圣地麦加之巡礼,陆海通商之旺盛,更促进其地理学之进步,于是中国知识,乃输入焉。直至十二世纪,东方知识,久为阿拉伯人所专有。

十三世纪,蒙古勃兴,亚欧交通复开,东方事情,乃再传于欧西。复因欧洲盛传极东有景教君主,遂引起欧人东方旅行之兴趣,西人之东方知识,于焉一新。

蒙古勃兴之后,至十四世纪中叶,东西交通犹盛,东方知识,仍传播于欧西。及蒙古内讧,渐近衰微;明初排挤西教,加以中亚细亚伊斯兰教复兴,东西因有阻隔,然间接传闻,未尝绝也。

从来欧人关于东方知识,多得于旅行之见闻,或事业之报告,至

十六世纪,东印度航路发现,耶稣会士东来,于东方文物,始进于研究之域。

十八世纪,仪礼问题发生,遂提高欧洲本土之极东探索,各教士皆为拥护本派,详细研究中国礼俗,其报告论战,甚刺激欧洲宗教界,东方研究,因而愈盛。

东来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偕并进,至十九世纪,汉学于焉确立。科学思想日益发达,殖民政策日益拓展,乃有大学之讲座,专门之学会,典籍之巨量庋藏,定期不定期之刊物,名家辈出,讨论益臻精详焉。

寅不揣简陋,述其发展过程及其近况,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辑成一书。尚希并世学人,有以正之,是所幸矣。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春日莫东寅谨识

序

国际汉学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国内一门蓬勃发达的学科,有了不少专门研究的机构,出了许多刊物、专著和丛书,然而追溯这门学科的萌生,有一本书是人们不会忘记的,就是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这本只有 168 页的“小”书,出版于建国前夕的 1949 年 1 月,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却是唯一一种中文的国际汉学通史,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些个人的回忆。莫东寅《汉学发达史》是在当时北平的文化出版社印行的,很快我便在书摊上买到一册,翻读之下,才知道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介绍和研究的概况,真好像打开了一扇宽阔的窗口。我被国际汉学所吸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汉学发达史》这本书,限于其时条件,纸张、印制都很差,若干年下来,书页都脆黄了,但我始终舍不得离开它。即使是“文革”时期,我的很多藏书都丧失了,这本《汉学发达史》还留在我的身边。

《汉学发达史》成为我走入汉学世界的向导。书的末了附有“参考书举要”,我选择其中属于汉学史性质的几种,按照出版次序,从图书馆找来阅读。这些书其实都是日文的,包括 1932 年的石田幹之助《欧人的中国研究》、1933 年的後藤文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的起源》(我还读过他的《中国文化西渐欧洲》)、1939 年的 W. Barthold

《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东方研究史》(日译本)、1940年的青木富太郎《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1942年的石田幹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与《汉学发达史》对照,才了解莫东寅先生是以《欧美的中国研究》为主,将上述各书内容融会贯通,并且参用了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材料。作为国内首创,这本书功不可没,尽管若干地方只是译载日本学者原文,由于晚清以来多有先例,也无可厚非。

关于《汉学发达史》的编著情况以及其间的优缺点,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刘国忠博士有《四十五年前的一部汉学史》专文,刊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建议读者参看。

相信有不少学者和我一样,是通过《汉学发达史》起始认识国际汉学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汉学的介绍和研究在我们这里冷寂了好多年,莫东寅先生与他的这本书,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记得我看到过他一种论作的题目,那是同汉学史全无关系的,看来他的工作领域已转移开。

国内的国际汉学研究真正起步,要到改革开放以后。孙越生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自1979年起出版,是这方面工作的先声。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出版《国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季羨林先生为之题写前言,还说“颇为感到吃惊”,然而这一学科的发展相当快速,到1997年春天,《中华读书报》就以《国际汉学研究“冷”板凳坐“热”》为题,在头版头条发布报道。用清华大学徐葆耕先生的话说,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研究业已“习焉不惊”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等先生的海外汉学中心,是这一学科的一支主力军,不但组织编辑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已出版十四辑,更在学科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大象出版社合作,编印“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等,即其显例。

随着国际汉学研究热潮的兴起,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也越来越

为公众重视。1989年,上海书店有影印本,但印数无多,大家仍不易见到。现在北外海外汉学中心对这本书进行了整理重新出版,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希望此举能促进新的汉学通史的编著,使国际汉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进步获有更好的基础。

李学勤

2005年3月21日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附录 四十五年前的一部汉学史

刘国忠

李学勤先生在《汉学漫话》(《东方》,1995年第1期)文中提到了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这是国内出版过的唯一一部外国汉学的通史,是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的,早已绝版。1989年,上海书店出了影印本,才有较多读者能够看到。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已经是多年前的旧作,内容自然是有些过时了,不过我们现在要研究汉学史,还不得不参考这本书。这本书运用的那些材料、吸收的那些成果,以及编著的体例和内容,都有我们可以借鉴之处。因此,下面我们就对这本书试作一分析。

《汉学发达史》一书,按时代顺序,论述了外国汉学研究的演进史。原书一共分七章,计169页,这七章在体例上前后有所不同,可分为前六章和第七章两大部分。第一到第六章主要是介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过程,以相当篇幅追溯了古希望和罗马关于中国的知识,以至后来与中国的接触、晚明以来传教士的活动等等,直到清代中叶。鸦片战争以后,汉学发达,诸国学者各有千秋,故书的第七章改为分国叙述,历数法、荷、德、英、俄、美、瑞典、匈、奥、日等国的汉学研究情况,比较详尽,篇幅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

莫东寅在写作《汉学发达史》时,曾参考了不少中外文献。这其中有两部专著与《汉学发达史》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分别是:张星娘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0年5月

出版),以及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所著《欧美对中国的研究》(日文,1942年创元社刊行)。大致而言,16世纪以前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张星烺的著作,16世纪以后的材料则多取资于《欧美对中国的研究》。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桃源(今江苏泗阳)人。早年赴美、德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他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这是一部按不同地区编辑而成的资料集,所包含的材料相当丰富,卷帙颇巨。书中有关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之材料在许多地方均有所涉及。莫东寅把这些相关材料摘录出来,按时间顺序重新加以排列,并删繁就简,加以扼要介绍。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相比较,《汉学发达史》的相关部分显得简洁、明快。

石田幹之助(1891~1974),日本大学教授,东方学会理事,东洋文库东洋学术会议评议员。他对中国古代史很有研究,也是汉学史的研究专家,并长期从事对欧美东洋史研究的报道评论。《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和后文中的《欧人の支那研究》、《欧人之汉学研究》为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法。——编者注)是他关于汉学史研究的一本论文集,包括论文15篇。

关于石田幹之助出版这部著作的目的,他在序言中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欧美的学者对中国的认识虽然不一定很深,判断也不一定切中要害,然而他们在治学方法上则有优长之处,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于这种吸收和借鉴欧美汉学研究的认识,石田幹之助对它们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在这些论文中,与本书同名的一篇《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同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关系最为密切(以下所提到的《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均指这篇论文)。

如果把《汉学发达史》与《欧美对中国的研究》作一番对比,不难发现,《汉学发达史》中不少篇幅是直接引用了《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原文,只是稍加修改而已。

以清康熙时在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莫书作“进”)为例,《汉学发达史》原书第81页是这样描述的:

白进 (Joachim Bouret, 1656 ~ 1730) 生于法国鲁满 (Le Mans), 居华时, 甚得玄烨之宠, 与张诚同为烨师, 讲述数学, 日夕亲炙其侧, 深知其性行及公私生活全部, 了悉其全貌。所撰《圣祖本纪》(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 表里描写, 毫无疏漏, 为考究烨传者, 所必参稽之书。玄烨因白进而深佩法国耶稣会士之学识, 使白进一旦归国, 图更招致多数优秀之士。白进奉命于一六九七年 (康熙三十六年) 归法, 携玄烨赠与路易十四之汉籍四十九册, 收于巴黎王室文库 (Bibliothèque royale, 今国民图书馆之前身): 当时藏于此文库之汉籍仅四册, 至是稍增其数。白进于故国新得优秀宣教学僧十人, 翌年一六九八年 (康熙三十七年) 率之来华, 其秋入燕, 宣教之外, 从事于中国文物之研究, 又受烨命, 分担清朝领内各地之实测, 努力于地图之制作。……

《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对白晋的论述在其第 19 至 20 页。把两者对比, 《汉学发达史》注出了白晋、鲁满、《圣祖本纪》的法文原名, 标出了西历纪元所对应的中国纪年 (如 1697 年为康熙三十六年), 补充了白晋的生卒年代和巴黎王室文库的旧有汉籍收藏等情况, 但其他绝大部分材料都沿袭了石田幹之助的原文。

又如明末南明政权向罗马教皇求援一事, 《汉学发达史》第 67 至 69 页有所论述:

明亡清兴之际, 明之宗室, 据华南各地, 欲挽狂澜于既倒者, 不止一二, 就中永历王由榔期间最长, 王太后及内官庞天寿, 尝致书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十世, 请求援助。贵此王太后及庞天寿书, 远渡欧洲者, 为耶稣会传教师波兰人卜弥格 (Michele Boym, 1612 ~ 1659), 卜弥格于此机会传中国事情于西方。一六五〇年 (永历四年, 顺治七年) 一月, 携亲书, 发广东, 自卧亚, 陆路经波斯, 一六五二年 (永历六年, 顺治九年) 九月至小亚细亚之士麦拿 (Smyrna), 二十九日, 于此地教会, 讲演中国事情, 该讲演一六五四年 (永历八年, 顺治十一年) 于巴黎出版, 题曰《中

国宗室之改宗及中国现状略说》(*Relation Briefe de la notable conucri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et de l'es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e*), 卜弥格自此由海路向威尼斯, 一六五三年(永历七年, 顺治十年)一月至罗马, 呈王太后等函于教皇, 教皇厅至一六五五年(永历九年, 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始与答书。翌年卜弥格于维也纳印行《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小册, 介绍中国珍奇植物, 兼及动物, 欧洲学者, 为之一惊, 尤关心于附载之关于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记事, 揭于维也纳刊原本此碑之篆额, 更引诸家注意。……

这件事在《欧美对中国的研究》第九至十页上也有类似记载。把两书相对比, 《汉学发达史》除注明了英诺森德的名字、卜弥格及其著作的外文原名、中西历对比等外, 还补充了卜弥格的西行路线。至于其他论述, 也完全与《欧美对中国的研究》一致。

类似的情况在此两书中还可以找出许多, 可见《汉学发达史》的相关部分是在《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基础上加以补改而成。

尽管《汉学发达史》同《欧美对中国的研究》在论述上有众多的雷同, 总体来看, 前者并非简单地对后者的照抄, 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加工和补充, 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例如在论述 16 至 18 世纪欧洲的汉学研究时, 石田幹之助将来华教士的中国研究与欧洲本土上的中国研究分而为二, 莫东寅则把这两者合而为一, 并把材料按年代顺序重新加以组织。对石田幹之助书中的一些琐屑之处, 莫东寅也作了删简, 如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出版情况, 石田幹之助在书中论述甚细, 莫东寅则未加采用。

更为重要的是, 19 至 20 世纪初是欧洲汉学名家辈出的时代, 各国值得记述的人物很多, 石田幹之助在叙述这一时期的汉学成就时, 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次第, 同时论述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 因而显得头绪很多, 比较凌乱, 不易为读者把握, 莫东寅没有遵循这种体例, 而是采取了细分国家、分别叙述的办法, 勾画出了法国、荷兰、德

国、英国等主要国家汉学研究的演进过程。这种做法，不仅使各个国家汉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而且还可以与石田幹之助原文后面分国记述的一节《欧美汉学研究的现状》合而为一。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各国对汉籍的收集与发表汉学论文的杂志，也同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石田幹之助的原书中有两篇这方面的论文：《欧美对汉籍的蒐集》和《欧美与汉学相关的杂志》。莫东寅摄取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增加到各国汉学研究状况的内容之中，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些必要的加工以外，莫东寅还在石田幹之助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

首先是在许多地方对史实作了一些补充。如第76页论述仪礼问题时，详细叙述了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材料在石田幹之助的原文中较少涉及。当时一些中国士大夫与汉学家们的交往情形，莫东寅也作了增补说明，如叙述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时，指出王韬曾给儒莲写信，盛赞他的汉学成就（见原书第95—96页）；讲到英国汉学家理雅格（James Legge）时，提及洪仁轩曾从之受洗礼；理雅格对中国典籍的英译过程中，王韬曾出了不少力等等（见第119页）。

其次是增加了不少背景材料。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汉学发达史》在叙述外国学者时，一般都标出他们的原名、中文名以及生卒年代，他们所写专著的外文名称也加以注出。在每一个具体年代上，还标明了中国当时的朝代年号，以便对照。这些做法在石田幹之助的专著中极为少见，有些甚至是绝无仅有。

第三是提供了不少新信息。汉学家们的论文或专著，有不少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莫东寅在介绍他们时，也将这些情况作了说明。如提到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时，指出冯承钧已有译本，于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97页）；叙及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时，提到陆侃如曾译了他的《〈左传〉真伪考》等三篇论文（第154页）；而李璜则节译了法

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并于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原书第101页)。

第四是增补了日本汉学的内容。日本是汉学研究的重要国家之一,论述汉学研究的历史,不能不介绍日本的情况。石田幹之助是日本人,对日本汉学自然十分熟悉。但他的这部书主要是向日本人介绍欧美汉学的研究情况,对日本的汉学研究并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因此,莫东寅又根据其他材料,在第七章中补写了“日本”一节,专门介绍日本的汉学研究状况。这既有助于读者对日本汉学的理解,也使《汉学发达史》一书对汉学发展的介绍更为全面。

还需要指出的是,石田幹之助的原书至今尚未有中文译本,对于不谙日语的读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便。《汉学发达史》一书有不少地方直接抄引了石田幹之助的著作,这有助于读者的了解。

与此同时,《汉学发达史》一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史实的错误。如原书中第71页述及杨光先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后,有“利玛窦等在华西教士皆被捕,送至广东”之语。这次事件发生在1664年,然而利玛窦(Matteo Ricci)早在1610年即已去世,这次事件中被逮捕的其实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而非利玛窦。这一错误的造成可能是莫东寅在翻译中不慎,误将汤若望译成利玛窦所致。另外,书中也偶尔有文字和年代上的印刷错误,如第82页对传教士白晋等人在法国西海岸扬帆而赴东方的记载中,法国的“法”字误印成“海”字。年代上的印刷错误尤其令人啼笑皆非,如康熙四年误为1865年(第78页),咸丰九年印成1359年(第119页),英国汉学家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的生卒年代赫然为1840~1984,成了一百四十余岁的大寿星。

总起来看,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在介绍和宣传汉学研究的历史上起着筚路蓝缕的作用,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然而这部书毕竟是在多年前写的,已经无法涵盖整个汉学研究史,这部书本身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热切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部新的、反映汉学研究演进全过程的汉学简史问世。

目录

□ 序	李学勤(1)
附录:四十五年前的一部汉学史	刘国忠(4)

一世纪至六世纪	(1)
——秦汉六朝时代欧人关于中国之知识	
七世纪至十二世纪	(8)
——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知识	
十三世纪	(16)
——蒙古勃兴时代西人关于中国之知识	
十四、十五世纪	(30)
——元至明初西人关于中国之知识	
十六、十七世纪	(42)
——明至清初欧西之中国研究	
十八世纪	(55)
——清代中叶欧西之中国研究	
十九、二十世纪	(68)
——鸦片战后汉学之发达	

□ 参考书举要	(123)
□ 编后记	张西平(125)

一世纪至六世纪

——秦汉六朝时代欧人关于中国之知识

东西交通与文化之交流，盖远自有史以前。据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等之研究，新石器时代后期，华北各地与南俄脱里波留(Tripolije)地方、多瑙(Donau)河下游方面之间，已有文化之交流^①。

然文献上最初记载东方知识之欧洲民族为希腊人^②。据希罗多德(Herodotos, B. C. 484 ~ B. C. 425)所著《史记》(*Historica*)，公元前七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隅顿河(Don. 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Htish R.)而入阿尔

① 石器时代中西交通之议论，始于安特生(Andersson)之发现彩色土器，参看：I. 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V, 1, 1923). 2. —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1934. 3. V. G.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25.

② *Classical writers* 之传记，参看 Pauly-Wissowa 之 *Realencyclopädie d.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Biographic universelle. O. Seyffert, Lexicon der Klassischen Alterthumskunde*. Leipzig, 1882. 此书增订英译之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 3rd ed, London, 1894. 另 Lippincott 之人名辞典。

希腊、罗马书籍关于中国之记载，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by H. Cordier. Vol 1: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London 1915. 搜集甚多。)欲更求完璧，可参看 G. Coedès, *Textes d'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 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为原文法译对照。